

【研究論著】 General Article

DOI:10.6163/TJEAS.202212_19(2).0003

《本朝通鑑》及《大日本史》史觀演化

O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f Honchô Tsugan and Dai Nihonshi[§]

徐興慶

Shing-ching SHYU *

關鍵詞：《本朝通鑑》、《大日本史》、武家政治、「水戶學」史觀、日本近代化

Keywords: Honchô Tsugan, Dai Nihonshi, Military ruling, Mitogaku historiography, Japan's early modern history

2021年11月29日收稿，2022年5月17日修訂完成，2022年9月22日通過刊登。

§ 本文係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日本水戶學史觀的形成與近代化轉型研究」（108.8-112.1，計畫編號：NSTC 108-2410-H-031-086-MY3）的研究成果之一。又，本文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給予諸多寶貴意見，獲益良多，謹此致謝。

*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客座教授

Visit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oochow University

摘要

本文從《本朝通鑑》及《大日本史》編纂背景與內容探討兩種史書的史觀演化及為政者的儒教受容之異同，人倫主義之內涵，進而從武家政治到文治政治的社會轉換與動向，論析兩部史書對南北朝正統論的經緯與異同及其與日本近代化、明治維新的關聯性。

Abstract

From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 of Honchō Tsugan and Dai Nihonshi,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hanges i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f the two history books and compares the sameness and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reception of Confucianism among the political leaders and the concepts of the Rule of Virtue.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social changes and transition from Japan's military ruling to civil governance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history book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modernization and Meiji Restoration in early modern Japan.

壹、前言

日本人編撰歷史書可以追溯到他們關注中國或朝鮮對日本或日本人的記載事項，以對外交史的視野來考察日本的外國史傳。例如：京都儒醫松下見林（1637-1703）的《異稱日本傳》¹、國學者本居宣長（1730-1801）的《馭戎慨言》²（寬政八年、1796）、伴信友的《中外經緯傳》³，以及水戶彰考館的儒學者小宮山楓軒（1764-1840）根據日本史書整理外國人事跡編纂的《西州投化記》（寬政6年、1794）等史書。這些對外交史的歷史書，自古代至近世，涵蓋邪馬台國、倭五王、九州博多志賀島出土金印、神功皇后三韓進出、遣隋使、遣唐使、元寇、倭寇等史蹟的記載。

日本的史書編纂，古代即有《日本書記》、《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等六國史，中世紀則有《吾妻鏡》⁴等史書，而這些歷史書多是為支持特定的政治勢力而寫。日本真正貫通歷史的史書，最早出現在德川前期的《本朝通鑑》，它是江戶幕府命令的官撰歷史書。還有延寶九年（1681）山鹿素行（1622-1685）編纂的《中朝事實》⁵以及水戶藩德川光圀（1628-1700）自一六五七年開始編纂的《大日本史》⁶。這三類史書都是在鎖國時期東亞國際

1 《異稱日本傳》是元祿三年（1693）出版的一部彙編作品，共三卷十五冊，將散見於中國書籍中關於日本的記載彙編而成。

2 《馭戎慨言》計二卷四冊，敘述自日本古代及豐臣秀吉出兵朝鮮的外交史。

3 《中外經緯傳》是天保九年（1838）由伴信友撰寫，共六卷，收錄在《伴信友全集》第三卷。其中提到日本為了一五九二年的萬曆援朝之平壤戰役軍力及兵器。這則史料雖然誇大了日本的出兵人數，但基礎的軍事武器卻少有造假，在其他的史料中也能得到印證。

4 《吾妻鏡》，又稱《東鑑》，「吾妻」是日本關東地方的總稱，是編年體史書。全書五十二卷（缺第四十五卷）。記載始於一一八〇年，以仁王的令旨傳至伊豆的北條館，終於一二六六年，主要內容涵蓋治承、壽永之亂與平氏政權的滅亡、鎌倉幕府的成立、承久之亂、執政之始。全書以編年體記述、如日記的文體，是變體漢文的一種，也稱為「吾妻鏡體」。

5 《中朝事實》是寬文九年（1669）完成的漢文歷史書，全二卷，附錄一卷。該書以日本朝廷為世界中心，稱日本作「中華」、「中朝」、「中國」，稱漢地為「外朝」，認為日本才稱得上「中華文明之土」。山鹿素行認為，「外朝」多次被夷狄征服，已失去文明；且「外朝」自春秋以降，多次因篡位弑君而改朝換代，不守君臣之義，已失去了「禮」，故不配稱「中國」。而日本則不曾受夷狄侵略，且自古以來有萬世一系的皇統，守禮守義，故可稱為「中華」。

6 同屬御三家的尾張藩主德川義直（1600-1650）也根據菅原道真（845-903）的《類聚國

的華夷思想及應對歐洲諸國東漸的壓力下，重新審視日本歷史的產物。

本文從《本朝通鑑》及《大日本史》編纂背景與內容探討兩種史書的史觀演變及為政者的儒教受容之異同，人倫主義之內涵，進而從武家政治到文治政治的社會轉換與動向，論析兩部史書對南北朝正統論的經緯與異同及其與日本近代化、明治維新的關聯性。

貳、《本朝編年錄》、《本朝通鑑》編修的緣起與背景

《本朝通鑑》的編纂可上溯到慶長九年（1604）藤原惺窩（1561-1619）與林羅山（1583-1657）的對談，間接影響了林羅山編纂史書的動機。林羅山十七歲開始立志學朱子學，傾讀《史記》、《漢書》、《後漢書》，更熟讀《通鑑綱目》，且身受其歷史觀、正統論之影響，他效仿朱熹（1130-1200），為日本著成《國朝綱目》。五十歲之後的林羅山再熟讀《資治通鑑》，理解《綱目》以朱子學的立場批判《通鑑》之經緯，其焦點圍繞在正統論、正閏論的相關問題上。

《本朝通鑑》初名為《本朝編年錄》，關於《本朝通鑑》的名稱，林鷲峰（春勝、春齋 1618-1680）提及：「寬文甲辰（1664）之秋，今大君幕下，命僕修續篇，而並先人所編，賜名《本朝通鑑》。」⁷原為效仿中國宋代史書《資治通鑑》及朝鮮的《東國通鑑》而更改為《本朝通鑑》，林羅山的《本朝編年錄》起草自寬永二十一年（1644）至寬文十年（1670），除了參照《舊事記》、《古事記》、《日本書紀》之外，還參酌公家的日記、野史、和歌及中國史書記載的日本事蹟，達七十餘種資料。可惜《本朝編年錄》於明曆三年（1657）的大火中燒毀。⁸寬文二年（1662）十月之

史》編纂了一部《類聚日本紀》。

7 林鷲峰：《本朝通鑑》，首卷，（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1920年），頁5。

8 林羅山奉幕府命令編纂的《本朝編年錄》（記述神武天皇至宇多天皇，但年代不詳，推測是擔任家康官職時期完成。之後由林鷲峰增修作為《本朝通鑑》正篇），詳請參考安川實：〈本朝編年錄の研究〉，《歷史教育》第10號10（1962年），後收錄在安川實：《本朝通鑑の研究—林家史学の展開とその影響》（東京：言叢社，1980年）。調查研究認為是已燒燬的內閣文庫（官本）草稿藏本，發現林羅山的《本朝編年錄》

後，經由林守勝、⁹林鷺峰、林春信等官學三代執筆，¹⁰寬文三年（1663）八月，幕府老中（大名家臣擔任要職者）的聯署奉書下達了幕府的許可，於上野忍岡¹¹的林邸啟開了自神武天皇至持統天皇的編年錄編纂。日本並無延喜年以後的正史，史料收集等編史事業停滯了許久，林鷺峰曾說：「延喜以來至冷泉帝，則國政多是出藤氏」（藤原氏族）；自後三條帝至近衛帝，則多是太上皇之政也。保元以後政權移於武家，此是國家之變，操筆者不可不知焉！」¹²提示往後的日本，政權會由朝廷轉向幕府。因此，寬文四年（1664），編史之初，林鷺峰即向老中酒井忠清（1624-1681）請求收集古記錄等必要的援助、同年七月，大名永井尚庸（伊賀守，1631-1677）被任命為編輯奉行，奉命提出諸大名、朝廷、寺社等所藏的各種記錄、同年八月由幕府編列預算，決定在林邸建造國史館（弘文院）作為編纂場所。全書於寬文十年（1670）完成，除了向將軍家提出稿本（中書本）之外，定稿（清書本）收藏於「紅葉山文庫」¹³及日光東照宮，又，《本朝通鑑》共抄寫五部，除上述三部外，另有足立學校及林家藏本。當時的國史館又稱「弘文院」，有其歷史背景，「弘文院」原為平安朝時代的大學別名，主要在向朝廷宣示幕府的權威，林鷺峰在一六六三年講授五經之後

的內容，與林鷺峰修改的《本朝通鑑》正編，非為同一版本，且林羅山在神武至宇多的記述幾乎照著六國史等的記述。

- 9 林守勝，林羅山之四男，林鷺峰的弟弟，又號誦耕齋，為江戶前期儒學家。正保三年（1646）成為幕府的儒官，創立第二林家。著作有『誦耕先生全集』。
- 10 林鷺峰擔任總編輯之外，長男梅洞（二十二歲）、次男鳳岡（二十一歲）、林羅山門人且與朱舜水深交的人見竹洞（1638-1696）以及儒者坂井伯元（1630-1703）等四人分擔不同時代的執筆。下設諸生、侍史、筆史等編輯員。再下設十四名傭書，總計編輯成員達三十人之多，皆由幕府支薪。詳見揖斐高：〈林家の危機—林鷺峰と息子梅洞〉，《成蹊國文》第48號（2015年），頁5。
- 11 上野山在日本戰國時代時被稱為「忍岡」，原是江戶城裡人口較少的地區。一六〇三年，德川幕府建立之際，忍岡是旁系諸侯藤堂高虎的宅邸，德川將軍修建為寬永寺，在神社、寺院的門前設立門前町。又因此地與藤堂家領地伊賀國上野的地形相似，寬永寺附近被改稱為「上野」。由於寬永寺是歷代將軍墓地所在，因此門前町的上野倍受德川幕府的保護。
- 12 《本朝通鑑》編輯方針是林鷺峰在一六六四年十一月朔日所做，見林鷺峰，〈國史館記並條例〉。
- 13 德川時代，幕府在江戶城內紅葉山設置的藏書文庫。源起德川家康於慶長七年（1602）六月在城內富士見亭收藏的古今漢籍、和書、古記錄，又稱「駿河御文庫本」。明治之後改稱「紅葉山文庫」，持續典藏歷代將軍的重要藏書，現為內閣文庫的一部份。

獲得「弘文院學士」¹⁴的稱號，此後順利繼承其父林羅山統領日本儒教的政策發展，進而明示他在朝廷公家的領導地位，之後林家即以「大學頭」的身分掌管了湯島聖堂。¹⁵古代唐朝在門下省早就設有「弘文院」從事史書的編纂，林家沿用這個稱謂，有跡可循。

《本朝通鑑》內含提要三十卷、附錄五卷、前編三卷（神代）、正編四十卷（神武天皇-宇多天皇）、續編二百三十卷（醍醐天皇-後陽成天皇）、《國史館日錄》十八卷，全三百二十六卷，歷時二十六年完成。全書為抄本，並無印刷本問世。《本朝通鑑》，至宇多天皇（867-931）時代稱為《本朝通鑑》，之後稱為《續本朝通鑑》，終於後陽成天皇（1586-1611 在位），總稱《本朝通鑑》。

坂本太郎指出《本朝通鑑》是日本萌芽期的歷史，修史事業與歷史觀、思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日本學術界自一九六〇年代以降，開始研究《本朝編年錄》及《本朝通鑑》的內涵，認為林家父子在思想上有所不同。¹⁶《本朝通鑑》要各級武士與人民向被盛譽為「神君」、「大君」的德川家康政權盡忠。¹⁷因此，《本朝通鑑》也是幕府企圖用以政治宣傳的歷史書。當時的幕府老中阿倍忠秋（1602-1675）曾說，若此書「成於當世，則大君之美之譽也。」¹⁸實際上，《本朝通鑑》的編纂工作始終受到幕府決策群的關切，不但派出官吏監督編寫，老中們也時常過問，經常到史館取走稿本

14 有關日本的弘文院學士，請參照高橋章則：〈弘文院學士の成立と林鷲峰〉，《東北大學日本語學科論集》第1卷（1991年），147-159頁。

15 湯島聖堂是林羅山於寬永九年(1632)在上野忍岡創設的孔子廟，現位於東京文京區，元祿年間由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下令遷移，之後一直延續至今。湯島聖堂在明治時期曾做為學校、議院與教育博物館之用，但在大正十二年（1923）關東大地震時，木造大門與正殿均遭燒毀。昭和九年（1934）由日本著名的建築師伊東忠太，以鋼筋混凝土仿木構造重建，入口取名「入德門」，本體由「仰高門」、「杏壇門」、「大成殿」及「東西廡」組成，與一般中國傳統的孔子廟空間類同，而庭園中更立有孔子雕像，聖堂立有「日本學校教育發祥地」的石碑。

16 藤實久美子：〈『本朝通鑑』編修と史料収集：對朝廷・武家の場合〉，《史料館研究紀要》第30號（1999年），頁116。

17 坂本太郎：《日本の修史と史学（日本歴史新書）》（東京：至文堂，1966年），頁158。

18 林鷲峰：〈寬文二年（1662）十月三日條〉，《國史館日錄》卷1，抄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請求記號862-127，コマ5。

審閱。¹⁹

一、林鷺峰與德川光圀對史書編纂理念的異同

在《本朝通鑑》籌畫編纂期間，鷺峰與光圀之間屢屢針對編輯方針交換意見，《國史館日錄》寬文甲辰年（1664）十一月二十八日有幾則相關記事，限於篇幅，以下僅就幾項關鍵的對話進行分析：

（一）

余以兼約，故赴水戶參議（光圀）邸，及秉燭詣參議（中略）參議曰：今度通鑑編為國為家為後世，文物盛時何以加之。珍重！珍重！其編輯之趣如何？余具陳之，參議曰：通鑑之名固重，伊賀守頗志文字之效也。余曰：此非所望，執政窺台命決之，然其發言者，伊賀守志也。然世人或以溫公、文公之例，於我輩為太過，余於馬、朱二公不可企望焉。然元、明之間所修稱通鑑者多，且朝鮮亦有通鑑，彼等何必以馬、朱二公自比乎！唯是當時相應之，才做先輩，例記實事則善惡自知，以為勸懲則此亦通鑑而已。

20

這裡多處出現的「伊賀守」即前述的大名永井尚庸，他被任命為《本朝通鑑》的編輯奉行，舉凡過去中國、朝鮮已經編纂的通鑑，都在他們討論、參考之列。

（二）

19 《本朝通鑑》編寫期間，幕府派官員松信重監之，見林鷺峰〈國史館記並條例〉。有關老中們經常過問並隨時將稿本取之閱讀的記錄，散見於林鷺峰的《國史館日錄》中。如寬文八年（1668）十一月二十九日、同年十二月二日以及十二月三日，幕府老中前後到史館詢問進度並閱讀原稿。

20 林鷺峰：〈寬文四年（1664）十一月二十八日條〉，《國史館日錄》卷1，抄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請求記號862-127，コマ63。

然凡稱《通鑑》者，文段有議論，此度不有教命則不加議論，非無遺恨。然編修功成則倣胡氏管見之例，聊擬范氏《唐鑑》之例，表出件件雖議論之亦不為難乎。參議曰：然抑安德西狩之後，正統猶在安德乎！然平氏之所立則以在洛帝為正統乎！後醍醐不傳位，高時立光嚴，尊氏立光明，此等之所孰以為正統乎！余（鷲峰）曰：此是本朝之大事，然非微意，先父曾於大友・天武事亦有所思，然上覽之書非無遠慮，故以大友不為帝，唯不準叛臣之例，亦馬子弒逆，厩戶不逃其罪，先父想可記，厩戶弒天皇，其事見文集，然於上覽之書則不能如意。今於某亦然，曾私修治承以來百餘年之事，於安德未崩之時，繫正統於此，分註記元歷年號，若夫於吉野事則未決考，帝統二流之本則光嚴・光明為嫡，後醍醐為庶，然光嚴・光明即位出賊臣之意則熟思以定之。²¹

「胡氏管見」指的是《資治通鑑綱目》，²²「范氏唐鑑」指的是范祖禹的《唐鑑》，這些中國史書的編纂模式，都在當時仿效的參考之列。參議是指光圀，他點出日本的北朝、南朝何者為正統？是編史的重點。當然是《本朝通鑑》編纂會談的大事。光圀詢問過鷲峰如何在編史時，處理安德天皇（1178-1185）及後鳥羽天皇（1180-1239）東西兩立及南北二朝共存的相關問題。針對光圀的提問，鷲峰並非沒有考慮過，述及先父羅山曾經思考過大友與天武（壬申之亂）之事，但考慮到史書乃進獻將軍的上覽之書而無法將大友視為天皇或叛臣。至於安德天皇與後鳥羽天皇的問題，鷲峰曾私修自源賴朝舉兵以來百餘年之事，將安德未崩之前視為正統，後鳥羽則以元歷為年號，分別註記。鷲峰也提及光嚴、光明兩帝為嫡流，但皆以賊臣的意圖即位，後醍醐為庶流，表示會好好思考再做決定。從《本朝通鑑》的首卷觀之，鷲峰重後鳥羽天皇，稱之為「新帝」而輕安德天皇，稱

21 林鷲峰：〈寬文四年（1664）十一月二十八日項下〉，《國史館日錄》卷1，抄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請求記號862-127，コマ64。

22 《資治通鑑綱目》是朱熹和其門人共同編纂的中國傳統史書（後文稱《通鑑綱目》），它結合《春秋》經傳與編年體的「綱目體」史書形式。《通鑑綱目》卷一到卷三十五以胡寅史評論贊為研究對象（亦即「胡氏曰」之下的史評文字），分析《通鑑綱目》是如何透過重新揀擇、剪裁、組織胡寅的《讀史管見》，展現一個理學家所欲追求的意義世界。

之為「先帝」，原因是支持安德天皇的平氏被源氏打敗，傾向以北朝為正統，因為皇統移往北朝系統之故。²³

(三)

馬公以曹魏為正統，其論世儒以為不正，然今所修妄以當時帝王之祖為僭，以南朝為正則書出之後未知朝議以為奈何，是非公命則所難私議也。若夫國老執政如君侯（光圀），知倭漢先例則余亦可開口，今以如此事妄與權臣議，則此度編修半塗廢亦不可知也。某自年少好倭朝事，而世人所不知者非無所發開，今幸承此命，欲使七百年來之治亂興廢以著于後世，故聊記事實以倣《通鑑》之體，於筆誅謹嚴之事則未能太快。然書成而如君侯之人見之、則或夫知某所有微意乎！參議完爾！又告曰：近世事者直書則有障，曲筆則有意者嘲之，不如與伊賀守議而留筆於百餘年以前而可也。余對曰：官議決以後陽成讓位為限、則今難辭焉！且當時事嫌憚亦非無先例、唯記實事則必無妨乎！參議默然！〔……〕參議曰：本朝文粹所載者，雖記於《通鑑》可也。續文粹以後稍劣，用捨而可也。²⁴

鷲峰說明司馬光以曹操之魏為正統，但世間儒者並不認同其史觀。現今編纂史書若妄以當今天皇的祖先（北朝）為偽，而以南朝為正統，此史書問世之後未知朝議會是如何？私議有其難處，建議此事必須公議。復說明自己承命編纂七百年來治亂興廢的修史工作，會仿效《通鑑》的體裁，多少會根據史實編纂，至於道德上嚴格筆誅之事則尚未考慮，整編問答隨處可見鷲峰受制且在乎於老中、執政等干涉修史的無奈。羅山、鷲峰父子之所以無法明確的倡議南朝正統論，是因為無法找出其理論依據的必然性。

針對此事，雙方的對談持續了好幾年，《國史館日錄》（寬文九年

23 武田祐樹：〈林家の學術と歴史書の編纂〉，《國際日本文學研究集會會議錄》（東京：国文学研究資料館，2014年），頁7、13。

24 林鷲峰：〈寬文四年（1664）十一月二十八日項下〉，《國史館日錄》卷1，抄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請求記號862-127，コマ64。

（1669）五月七日）仍可找到如下的記載：「相公在焉。先進膳，而談《本朝通鑑》之事，疑問數條，聊辯解之。相公快然。其餘或及漢朝歷代事，論高祖光武優劣，或辯曹操劉備正偽，或議韓、柳、宋元明文章，或談本朝神道佛者事，或竊及當時事。其中有相合者，或有執拗者，是此公之癖也。」足見二人的史觀是有所不同的。

《本朝通鑑》卷一三二，自後醍醐天皇（1288-1339）逝世，曆應三年（1340）開始寫起，述及視北朝為正統的內容如下：

按後醍醐帝延元元年遷幸吉野。自是有南朝、南帝之稱。然後醍醐無讓位之儀。光明帝為尊氏被立。則終後醍醐之世。乃帝統之正。可在吉野。至後村上則不可無都鄙之辨。況北帝運，傳至今日哉。故至此，以北朝為止。附南朝於其間。²⁵

後醍醐天皇（1288-1339）為實現皇權的統一，歷經多次的倒幕運動，被稱為日本歷史上最剛毅不屈的倒幕天皇，他在鎌倉幕府結束後實施「建武新政」，由於足利尊氏的反叛而南狩大和吉野，建立南朝政權（又稱吉野朝廷），成為南朝第一任天皇，但他並未讓位給足利尊氏支持的光明天皇，因此可說成正統的天皇仍在吉野。後村上天皇（1328-1368）²⁶繼任南朝第二任天皇之後，歷史上對其正統性即有不同的詮釋，在現實面，南朝屬於地方政權，但北朝仍然統治全國。有鑑於此，《本朝通鑑》以後醍醐天皇一代為正統，之後即以北朝為正統，成為「兩統」併記的歷史書。

二、《本朝通鑑》採用「吳太伯論」的真相

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1641-1680）於寬文十年（1670）六月十二日就任之際，將御三家的水戶光圀、紀伊（今和歌山）光貞、尾張（今名古屋）

25 林羅山、林鷺峰：〈續本朝通鑑〉卷一百三十二，收入《本朝通鑑》，第十二，（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1919年），頁3803。

26 後村上天皇為日本第九十七代天皇，也是南朝第二任天皇。初名義良，後改憲良。他是後醍醐天皇的第七皇子，為阿野廉子所生。明治四十四年（1911），日本政府確認南朝朝廷系統的天皇為正統，後村上天皇被當作日本歷史上的第九十七代天皇。

綱誠等諸侯召進將軍府，討論正史並無記載之日本的國祖吳太伯是否為神武天皇的相關問題。根據北畠親房（1293-1354）的《神皇正統記》（1343），太伯為日本祖先之說，在應神天皇時隨《晉書》傳入。²⁷林羅山·林鷺峰父子肯定「吳太伯論」雖是事實，但這僅止於個人意見，從結果看來，幕府的修史事業並無採用「吳太伯論」。林羅山述及：「聞太伯可謂至德，則仲尼之語也。後世執簡者，以為本邦為其苗裔，俗所稱東海姬氏國之類，何其誕哉！本邦元是神靈之國也。何故妄取而為祖乎！（原漢文）」。²⁸換言之，德川時代的知識份子大部分只接受太伯是中國聖人，不相信他與神靈之國或日本皇室有任何關係。林家的「吳太伯論」引起其它儒學及史家派系的不滿，卻是一個事實。其中以兵學家山鹿素行（1622-1685）反對最為強烈，他說：「如佛教者，徹上徹下，悉異教也。〔……〕天下終息染不如其異教，牽合附會以神聖為佛之垂跡，猶腐儒以太伯為祖。」²⁹他認為以太伯為日本神武天皇者是「腐儒」的行為。此外，崎門及水戶學派的反應亦為強烈。山崎闇齋（1618-1682）及其崎門學派歌頌太伯的德行，但否定他與日本皇室的關聯性。³⁰針對吳太伯與日本神武天皇的關聯性問題，水戶學派的藤田東湖（1806-1855）亦提及德川光圀有如下的看法：

公（光圀）嘗與尾（尾張）、紀（紀伊）二公在幕府，適有撰一史請刊行者，公繙閱，至於以吳太伯為神州始祖，大駭曰：「此說出於異邦附會之妄，我正史所無。昔後醍醐帝時，有一妖僧，倡斯說，詔焚其書。方今文明之世，豈可使有此怪事，宜命速削之。」二公左袒其議，遂停刊行。（原漢文）³¹

-
- 27 北畠親房（著），佐藤仁之助（校訂）：《新註神皇正統記》（東京：青山堂書房，1927年），頁45-46。
- 28 林羅山：〈太伯〉，收入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東京：べりかん社，1979年），卷36，頁408。
- 29 山鹿素行：《中朝事實》，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第13卷〈附錄·或疑〉，（東京：岩波書店，1941年），頁370。
- 30 吳偉明：〈日本德川前期吳太伯論的思想史意義〉，《新史學》二十五卷三期，2014年9月，頁156。
- 31 藤田東湖：《弘道館記述義》，收入菊池謙二郎（編）：《東湖全集》，（東京：博文

德川光圀認為幕府編纂的《本朝通鑑》採諸多無稽之說，若普及於天下，將貽誤萬代，史書的刊行則成為德川將軍家之恥，此國醜將流傳異國，³²當著林鷺峰及諸多幕臣面前，指出編輯內容有誤，建議修正。林鷺峰在寬文九年（1669）《本朝通鑑》神代紀跋文亦提及「若夫少康，泰伯之事，則異域之所傳稱，今不取焉！」³³否定了「吳太伯論」。相對於此，內藤燦聚、內藤耻叟、栗田寬、木村正辭等學者認為是德川光圀批判了「吳太伯論」，《本朝通鑑》才將之刪除。吳偉明指出：「吳太伯在德川日本的地位特殊，不但被接納為中國古代聖人，部分日本人甚至認為他是日本皇室的祖先。這種與中國不同的價值取向正反映吳太伯傳說是在日本風土下發展及挪用的論述，而非原封不動從中國輸入的外來文化。」³⁴認為「吳太伯論」的本質，發現不論支持或否定日本太伯傳說的人，其實均利用此論述肯定作為日本人的身分認同，充滿強烈的自國本位主義色彩。」³⁵呂玉新則指出：「林家編纂《本朝通鑑》另有一個重要目的，即要讓它成為各級武士習儒的範本，主要在培養武士忠君盡責的精神，在編寫綱領中，顯現了他們的儒學觀點。《本朝通鑑》對於神教和京都朝廷曾當作國教的佛教，對於神社、寺廟等諸事，不予重視，能略則略。」³⁶

張崑將則指出：「以吳泰伯為神武天皇之始，最早不是儒學者，反而是佛學者，而且以後陸續有私家修史者一直以吳泰伯為日本之神武天皇。提及僧人中巖圓月（1300-1375）曾修《日本紀》（《日本書紀》），觸犯日本神國禁忌而被燒毀，引發日本學術界探討中國至德之人取代神武天皇的修史事件，認為此事若為真則喪失日本文化的主題性，是難以發生的事情。」³⁷《本朝通鑑》完成後，林鷺峰說明：「余曰中華通鑑名聞於世，朝

館，1941），頁 175-176。

32 村上元三：《水戶光圀》（中卷），（東京：學陽書房，2000年），頁 215-216。

33 林鷺峰：《本朝通鑑》，3卷，（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1920年），頁 45。

34 吳偉明：〈日本德川前期吳太伯論的思想史意義〉，頁 146。

35 吳偉明：〈日本德川前期吳太伯論的思想史意義〉，頁 146。

36 呂玉新：《政體、文明、族群之辯：德川日本思想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 72-73。如林鷺峰在編史條例（共十條）中指出：「一、執柄並諸廷臣行實，據事直書，則其跡之善惡自見焉。善以可勸，惡以可懲者，雖小官可暨焉。〔……〕一、學校之興廢並儒家之博覽文藝詩才，及達倭歌者可載之。忠臣、孝子、貞女，雖微賤不可漏焉。一、神社、佛閣之經營及僧徒之事，其大者載之，其小者可略之」。

37 張崑將：〈日本德川時代神儒兼攝學者對「神道」「儒道」的解釋特色〉，《臺大文史

鮮亦有《東通鑑》，則我國之史，稱通鑑而可也，先父謙而假稱《編年錄》，今若官議決而稱通鑑，則先父之志也。」³⁸完成了林羅山生前的遺志。這部編年史在修史體例、修史文字、武家權力變遷的史觀、史論等方面，為後世日本史學的發展提供了參考借鏡，是德川時代官方修史中最具影響力的編年體通史，亦是引導近世日本史學由萌芽走向繁榮的經典史書。

林鷺峰在《本朝通鑑》完成後十年，延寶八年（1680），六十三歲病逝。林家第三代林鳳岡（春常、信篤，1645-1732），三十七歲繼承「家督」，並任大藏卿法印、弘文院學士。受到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1646-1709）的信任，元祿四年（1691）四十八歲接受「大學頭」之職，進而擴充湯島聖堂及上野忍岡的家塾，綱吉令他為殿中諸士講授儒學。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1684-1751）繼位後，林鳳岡再度受到信任，參與幕府文書行政，並負責接待朝鮮通信使。

參、《本朝通鑑》儒教思想的內涵

眾所周知，《古書記》、《日本書記》均記載儒家思想約在五世紀初即傳入日本，百濟人王仁更早於應神天皇十六年（285）即將《論語》及《千字文》帶入日本。對日本而言，儒教思想原本是外來文化，與傳統的神道文化互有排他性，但中世紀以降，兩種文化磨合的結果，產生了和平共存的意識形態，進而出現了「和魂漢才」的概念，而儒教思想在日本的發展也隨著時代的變遷產生了質變。尤其在一一八五年鎌倉幕府成立之後，日本由於武士階層的崛起而儒學的政治倫理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中國傳統的儒學強調長幼尊卑、忠誠服從的社會秩序，成為幕府大將軍鞏固自己政權，設定階級統治制度的翻版，到了德川時代更將朱子學列為國家學問的官方哲學，前述藤原惺窩及林羅山師徒即是扮演日本儒學發展承先啟後的重要推手。

哲學報》，第 58 期（2003 年），頁 153。

38 林鷺峰：〈寬文四年（1664）十月十九日條〉，《國史館日錄》卷 1，抄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請求記號 862-127，コマ 11。

藤原惺窩曾以宋明理學的「理一分殊」理論，說明封建制度的合理性，提倡君臣各盡其責，各守其職。他曾說：「日本之神道以正我心，憐萬民，施慈悲為奧秘，堯舜之道亦以此為奧秘也。唐土曰儒道、日本曰神道，名變而心一也」。³⁹強調二者名不同而心一致的重要性。林羅山曾說：「我朝神國也。神道乃王道也。〔……〕或問神道與儒道如何別之？曰：自我觀之理，一而已矣。王道一變，至於神道。神道一變，至於道。道，吾所謂儒道也，非所謂外道也」。⁴⁰論析儒道非外道的特質。如前所述，林羅山模仿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編纂《本朝編年錄》，為的是宣傳上下階級的重要性。

一、鎌倉時代儒家的德治論

日本鎌倉時代中期以降，宋學入傳日本，大量中國宋儒的經典被中國禪僧和日本僧人帶進日本。中國禪僧帶動了日本的儒學的傳播及其發展。鎌倉時代南北朝和足利氏時代（室町時代）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係，原本並不要求把儒學作為統治的意識形態，而僅僅是將它同神道及老莊思想一起保存下來作為從屬於佛教的一種教養而已。但「承久之亂」⁴¹後，儒家政治論是由有德者為君、治世安民論、易姓革命等概念建構而成，亦可稱之為儒家德治主義思想。「承久之亂」時，傳統的公家勢力與新興的武士勢力之間以武力對決，結果由武士階級獲勝，致使被認為是神孫的天皇，以及過去以天皇為中心，牢不可侵的公家政權之神話崩潰，爾後儒家的德治主義得以在日本社會取代「神孫為君說」的窠臼，開始發揮其功能。

從東亞儒學的整體發展而言，儒學本來就與教育問題密不可分，儒學東傳日本之後，德治主義對日本社會的影響亦相當深遠。在後嵯峨天皇

39 藤原惺窩（著）、林道春（編）：《惺窩文集》，卷 4（京都：田原仁左衛門尉出版，1654 年）。

40 林羅山（著）、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 下卷》，卷 66（1918 年平安考古學會版・1930 年弘文館社復刻版，東京：べりかん社，1979 年），第 804 頁下。

41 承久之亂，是日本鎌倉時代承久三年（1221）後鳥羽上皇為打倒鎌倉幕府，舉兵討幕的一場戰爭。朝廷失敗，後鳥羽上皇遭配流隱岐。結果確立幕府的優勢，朝廷權力受到限制，幕府在京都設置監視朝廷的六波羅探題，甚至擁有決定皇位繼承等的影響力。

(1220-1272) 之後，皇統分為後深草天皇系統的持明院統與龜山天皇系統的大覺寺統兩派，交替接續皇位。⁴²過程中，兩統必須能夠施行「正確政道」，同時要推動積極性的善政才能尋求皇統繼承的資格。因此龜山院·伏見院·後伏見院·後宇多院，均決定改革、整備院政組織。幕府及武士政權則藉由吸收儒家思想，以施政於天下而施民於善政，作為政權存立的依據，此時期的當政者多以儒家的德治思想為基礎，致力於君德涵養的普及。舉例而言，花園天皇（1297-1348）在《花園天皇宸記》正和六年（1317）三月三十日的條目中述及：「朕隨分稽古，學雖不至，勵心勤德施仁，若此一得纔叶天意歟！」，展現出身為儒家德治主義為政者的自覺。

43

二、室町時代儒家思想的演化

建武三年（1336）成立的室町政權在與南朝大臣公卿北畠親房（1293-1354）及北朝二條良基（1320-1388）時期，儒家德治思想的政治理念並非全盤接受，而是以承認天皇作為君主形式，亦即存在於武士政權之上的「有德者執政論」之形式，來接納儒家的德治思想，以「有德者執政論」來合理化室町政權的存在。換言之，南北朝時期，藉由透過幕府推動儒家德治思想的相關法令，以合理化初期室町政權的存立。

另一方面，在北畠親房撰寫的《神皇正統記》（六卷）中，三神器之鏡子·勾玉·寶劍各自被視為正直·慈悲·智慧的象徵性代表物品，這三德是作為君主必備的條件，亦即君主具備這三德後，始能被稱之為君主。強調日本是神造國家，王室是神統，其他國家並無此例，論述了南朝的正統性，對院政和武家政治持批判態度，對後世的歷史觀、國體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42 後嵯峨天皇禪位予其子後深草天皇後，又因愛幼子而反悔，廢長立幼，逼退了後深草天皇，立了另外一位愛子恆仁為龜山天皇，造成兩系皇統對立，後深草天皇子孫稱為持明院統，龜山天皇後裔稱為大覺寺統，雙方在鎌倉幕府的調停下，決定兩系皇室分別繼任天皇，史稱兩統迭立。

43 花園天皇：《花園天皇宸記》正和六年（1317）三月三十日條目。

日本至戰後以降，有不少研究均將《神皇正統記》的歷史觀定位為道德史觀，亦即天與人相互交涉的儒教歷史觀，但玉懸博之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北畠親房所強調的是神與人相互交涉而展開的歷史，因此親房的歷史觀應該稱之為神道史觀。⁴⁴此外，南北朝初期有一本軍事物語《梅松論》（二卷，作者未詳，1349年）記述自北條氏執權、南北朝動亂至足立尊氏、直義成立幕府的經過，主要顯彰初期室町政權的正當性，標榜相關武士的功績，有別於彰顯南朝政權的《太平記》。

《梅松論》的「政道論」雖然同時承認「有德者為君說」的撫民仁政主義及「神孫為君說」的血統主義，但主要從德治主義的立場反抗朝廷並釐清「承久之亂」的始末，要求為政者具備德性以實現安民，對於無法合乎此要求的為政者主張強制更換，《梅松論》被認為具有歷史及天意歷史觀兩種特質的史書。⁴⁵對武士政權而言，儒家的德治思想成為對抗公家政權的武器則是不爭的事實。玉懸博之認為，君德論及安民論構成北畠親房的政道論，與儒家的政治論、德治主義思想極為相似。親房在合理化武家政權的同時，也藉此形成擁護公家政權的政治思想。作為北朝最高公家階級的二條良基，一直以來都被認為在政治思想上較無定見，但也積極地採納儒家德治主義思想。⁴⁶

寬文六年（1666）六月，林鷺峰門生筆錄的《史館餘話》⁴⁷中，對於南北朝並存的問題，林鷺峰在這個時間點僅私下表示「二帝無輕重」，並未正面表示何者為正統。反觀德川光圀則認為足利尊氏在鎌倉反叛後醍醐天皇，後來又攻入京都流放天皇，將他列入逆臣之中，而視南朝為正統。「南朝正統論」做為日本明治維新的尊王斥霸思想，否定了北朝政權的正統性，其理由有二。（一）前述後醍醐天皇之吉野朝廷並未讓位給光明天皇。（二）德川光圀一脈相承的水戶學派人士咸認為足利尊氏對後醍醐天

44 玉懸博之：《日本中世思想史研究》（東京：べりかん社，1998年）。

45 玉懸博之：《日本中世思想史研究》（東京：べりかん社，1998年）。

46 玉懸博之：〈南北朝期の公家の政治思想の一側面—北畠親房・二条良基における儒教的德治論への対応をめぐって—〉，《日本中世思想史研究》（東京：べりかん社，1998年），頁176。

47 林鷺峰：《本朝通鑑》，首卷，（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1920年），頁159-161。

皇的叛逆行為極端霸道，故視之為叛臣，以凸顯水戶學彰顯大義名分儒家倫理思想之重要性。

肆、《大日本史》的編史背景及核心史觀

《大日本史》是一部以漢文編纂的紀傳體史書，起草於御三家的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他因明曆三年（1657）大火小石川藩邸燒失，而將遷至駒込別邸，在此設立史局開始編纂事業。一六七二年再將駒込別邸之史館遷回小石川本邸，並命名為「彰考館」。⁴⁸爾後，光圀集水戶藩儒佐佐十竹、栗山潛鋒、三宅觀瀾、安積澹泊等人進行編纂。在編纂過程中派遣佐佐十竹等人赴京都、奈良等地博搜古文書、古記錄等史料，有些史料檔案收藏在寺廟，如「高野山文書」、⁴⁹「東大寺文書」和朝廷「公家」（kuge），他親自寫信請求給他的調查員提供方便，借閱抄寫相關史料，對相關的內容進行嚴謹的校對。

《大日本史》用漢文撰寫，光圀去世後，由朱舜水的弟子安積澹泊（覺，1656-1738）繼續主導編纂，第三代藩主德川綱條（1656-1718）將這部史書命名為《大日本史》。正德五年（1715），《大日本史》本紀七十三卷、列傳一百七十卷、目錄四卷總計二百四十七卷的謄寫本（又稱正德本）供奉於德川光圀的墓前。享保五年（1720），校正完成的本紀七十三卷、列傳一百七十卷，加上序目、修史例、引用書目共計二百四十卷獻給幕府，稱為「享保本」。天明六年（1786）《大日本史》的編纂事業再度展開，在塙保己一（1746-1821）⁵⁰的協助下，對「本紀」、「列傳」進行校對，於嘉永二年（1849）向幕府與朝廷獻上本紀七十三卷、列傳一百七十卷的出版物。相當於制度史的《志》、《表》至幕末、明治時期，以豐

48 「彰考」語出《易·繫辭下》：「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孔穎達疏，「往事必載，是彰往也；來事豫占，是察來也」。高亨註，「彰往，表明往事也。察來，觀察來事也」。

49 久保田収：〈高野山における歴史研究〉，《密教文化》1956年，36-37號，頁22-42。

50 塙保己一是活躍於德川時代後期的全盲學者。擁有驚人的記憶力，他完成了日本的大文獻集《群書類從》（666冊）的編纂工作。

田天功（1805-1864）、栗田寬（1835-1899）為中心的學者繼續編纂，完成了十志（神祇、氏族、職官、國郡、食貨、禮樂、兵、刑法、陰陽、佛事）與五表（臣連二造、公卿、國郡司、藏人檢非違使、將軍僚屬）等編纂事業。《大日本史》涵蓋七十三篇本紀，一百七十篇列傳，一百二十六篇志，二十八篇表，共三百九十七卷，起至神武天皇，終於南北朝結束的一三九二年。全書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完成，計四百〇二卷二百三十一冊，編纂過程長達二百四十九年之久。

一、德川光圀的核心史觀

德川光圀主編《大日本史》期間，主要完成了「本紀」與「列傳」部分，即以記述傳記為中心，從儒家道德觀對歷史人物進行評述。光圀在自傳《梅里先生碑文》中說道：「正閏皇統，是非人臣，輯成一家之言」。亦即該書將光圀自己的主張，藉以歷史敘述的形式加以表述。《大日本史》的三大特筆是（1）將神功皇后列入《皇妃列傳》，（2）認定大友皇子的即位，並將之列入《本紀》，成為大友天皇本紀一篇，（3）以南朝為正統，將南朝諸帝列於本紀之中。⁵¹

此外，光圀於寬文元年（1661），接替水戶藩第一代藩主德川賴房（1603-1661），成為第二代藩主。但其上有兄松平賴重（1622-1695），光圀越過兄長繼承藩主，內心一直感到愧疚，即於寬文十一年（1671）六月，立其兄之子綱條（1656-1718）為養嗣子，並於元祿三年（1690）十二月將家督（藩主）讓位給綱條，有還政於長兄，有將「嫡脈」的正統血統歸還水戶家系的意涵，而成為水戶藩讓位德政的佳話。此外，光圀「長幼有序」的道德規範也反映在他編纂《大日本史》承認南朝為正統的思想脈絡上。因此，三大特筆、「長幼有序」以及對君主忠誠，絕對服從的道德規範也

51 《大日本史》史臣以南朝擁有三神器為正統，但南北二帝都有皇室血脈，因此以南朝天皇入本紀，並在實現南北統一的後小松天皇本紀開篇附入北朝天皇的記載，稱北朝為「帝」以有別於南朝天皇。但是，所謂「三大特筆」並非光圀的創見。林羅山在《羅山文集》中已經提出否認女帝以及承認大友的即位為正統，只是未徹底承認南朝而已。詳請參閱安川實：《本朝通鑑の研究—林家史学の展開とその影響》，（言叢社，1980年），頁35-38。

代表了光圀的核心史觀。

二、安積澹泊「論贊」的史觀

寬文五年（1665）朱舜水受聘抵江戶之際，安積澹泊（1656-1738）僅十一歲即入其門下，天和三年（1683），澹泊以編輯的身分進入彰考館，承光圀之意協助編纂《大日本史》，元祿六年（1693）至正德四年（1714）成為彰考館總裁，其間完成了《大日本史》紀傳的編輯。澹泊在光圀去世之後的寶永五年（1708），適度增補了光圀生前未曾認同的「將軍傳」，承認將軍的特殊地位，將軍雖非南朝所任命，但他將足利尊氏、義詮父子納入將軍傳。其目的是為了將這部標榜紀傳的歷史書順利上呈朝廷及幕府，反映了澹泊的折衷思想。

安積澹泊執筆的「論贊」中，兩系皇統的對立過程，對持明院統初代的後深草天皇（1243-1304）對比聖人周文王，評價很高，⁵²而對大覺寺統皇系始祖龜山天皇（1249-1305）⁵³即認為其德不足，評價較為嚴苛。⁵⁴表面上，光圀以大義名分為信念，承認南朝為正統，但整體而言在道德規範較為優越的持明院統（北朝）本來就是正統的皇統。吉田俊純指出：道德上優越的北朝歸一皇統，確立武家政權不會動搖是《大日本史》編史的結論。亦即光圀在《大日本史》編纂學問上的目的，是在名分上本來不應該有的武家政權之成立過程中，光圀以名分論的立場將之合理化。⁵⁵光圀之所以承認南朝為正統，在於現職的後醍醐天皇為了恢復朝權不惜率先奮戰，並未讓位給持明院統，這是在名分論、對君子忠誠上的認同。此外，後醍醐天皇在出逃時帶走代表天皇權威的三種神器（八咫鏡、瓊曲玉、草薙劍）的

52 詳請參閱安積澹泊：〈後深草天皇紀の贊〉，《大日本史贊藪》，收入松本三之介、小倉芳彦（校注）：《近世史論集》，《日本思想大系》，第48卷（東京：岩波書店，1974年），頁62-63。

53 大覺寺統（南朝）是鎌倉時代後期日本皇室的一個家族，與建立北朝的另一支家族持明院統形成對立局面。大覺寺統的皇室為第九十代龜山天皇的子孫。也由於兩個家族的紛爭，開創了日本南北朝。

54 前掲安積澹泊：〈龜山天皇紀贊〉，《大日本史贊藪》，頁63-64。

55 吉田俊純：〈徳川光圀の『大日本史』編纂の学問的目的—北朝正統論をめぐる〉，《東京家政学院筑波女子大紀要》第2集，1998年，頁2。

所歸為基準，南北朝對立時，三種神器在南朝手中，故南朝教具正統性。但從前述光圀「長幼有序」的道德規範而言，北朝正統論對光圀的信念造成矛盾。自己將家督（藩主）讓位給兄長之子，理應不會承認弟家的南朝大覺寺統，只能說光圀在此時間點上是信念勝於理論了。⁵⁶

安積澹泊的修史觀念雖含有光圀以來儒教普遍主義的思維，但這樣的思維在以歷史過程為依歸的編史脈絡中，仍然存在著矛盾的問題。光圀到了晚年，其嚴謹的名分論有趨於緩和的跡象，原因就在於南北朝承認的矛盾問題。亦即表面上，基於日本式的道德觀念承認南朝為正統，但潛伏在內心根柢的儒教道德觀則必須承認北朝為正統，這個矛盾如何調和與表現則是光圀的一大難題。⁵⁷對此，吉田俊純再指出，所謂「儒教正統論」來自正確的道德行為及大一統，亦即國土的安定與統一等兩項要素，但當時兩統並無國土爭奪戰的問題，因此就無需考慮大一統的問題。⁵⁸

此外，《大日本史》記述對象起自神武天皇，終於南北朝合一，是繼承《神皇正統記》的精神，前述北畠親房⁵⁹在後醍醐天皇崩之後，持續與足利幕府的賊軍苦戰，在吉野維護正統的王朝，可以窺知光圀是受到他復興王朝的道義精神感化。光圀之所以重視《神皇正統記》，與以朱子學解釋神道教思想，推動尊皇的山崎闇齋（1619-1682）學派有關，因其啟用的水戶藩編史人才如鵜飼真昌、栗山潛峰、三宅觀瀾等皆為崎門俊秀⁶⁰，與

56 吉田俊純：〈德川光圀の『大日本史』編纂の学問的目的—北朝正統論をめぐる〉，頁12。

57 吉田俊純：〈德川光圀の『大日本史』編纂の学問的目的—北朝正統論をめぐる〉，頁12。

58 吉田俊純：〈德川光圀の『大日本史』編纂の学問的目的—北朝正統論をめぐる〉，頁8。有關大一統的要素，林家的《本朝通鑑》將後醍醐天皇為止視為南朝的正統，以後做為北朝的正統，即為正統論的論證事例。

59 北畠親房出自村上源氏庶流，祖先是鎌倉初期的源通親。後醍醐天皇繼位時，吉田定房、萬小路宣房和北畠親房計劃復興皇室，推翻鎌倉幕府，被稱為後醍醐天皇近侍後三房。正中三年（1326），後醍醐天皇將次子世良親王託付給親房教導。然而世良親王突然病逝，親房因此引咎出家，法號宗玄。元弘三年（1333），鎌倉幕府滅亡後，後醍醐天皇回到京都，任命北畠顯家為陸奥守，親房也去鎮守東北地區。足利尊氏發動叛亂，南北朝開始，親房提出「東國經營」。之後親房轉戰關東各地。興國四年（北朝康永元年，1342），親房被迫回歸吉野，跟隨後村上天皇。正平九年（北朝文和三年，1354）病歿，享年62歲。明治四十一年（1908）九月九日，追贈正一位。

60 詳見名越時正：〈水戶藩における崎門学者の功績〉，《水戸光圀とその餘光》（東

林鷺峰的編史人員的皇國史觀理念大相逕庭。皇國史觀是日本以天皇為中心，評斷歷史人物、事件之於天皇屬於忠誠或是叛逆之觀點而出發的思想。其肇始者為日本南北朝時期，隸屬南朝的北畠親房，他為了發揚南朝之正統性而著作《神皇正統記》。《大日本史》繼承其觀點，設立叛臣、逆臣傳，瘡罰謀逆之人。如《大日本史·逆臣》傳序「弑逆，人神所共憤，而天地所不容也。一有弑逆之臣，則人人得而誅之。其得保首領、老死牖下，乃幸而免耳。異邦之史，臣弑其君者，歷世不絕」。⁶¹忠誠或叛逆的行為成為判準是否為正統的指標之一。

三、《大日本史》南北朝正統、閏統的史觀

日本自鎌倉時代以降，實際統治全國政權的並非天皇或朝廷，而是武家（幕府）政權在推動國家的公權力。這個歷史的過程，如何具有理論且一貫性的論述，是前述林家《本朝通鑑》及水戶家《大日本史》等修史者必須面對的課題。德川光圀在世時《大日本史》編纂的主要重點在「百王本紀」（起自卷一神武天皇，終於卷七十二後小松天皇），此時期自光圀三十歲時在江戶小石川創立「彰考館」開始至寬文年間將完成的「享保本」呈獻幕府、元文二年（1737）「元文本」完成為止，形成了「前期水戶學」。寬政以降，德川幕末、明治時期為止的二百數十年，稱為「後期水戶學」。其間，面對「南朝政統論」的修史編纂，前後期即有很大差距，而《本朝通鑑》及《大日本史》對南北朝何者為正統，在認知上亦大相逕庭。

中日學術界一般認為《本朝通鑑》編史的史觀脈絡是仿效《資治通鑑》，而《大日本史》則根據《通鑑綱目》編纂，但栗原茂幸則認為《大

京:錦正社,1985年),頁163。此外,內田周平:〈崎門學者と南朝正統論〉,收入平泉澄(編):《闇齋先生と日本精神》(東京:至文堂,1932年),頁97-178。鳥巢通明:〈大日本史と崎門史学の關係〉,日本學協會編《大日本史の研究》(東京:立花書房,1957年),頁235-280,一併參照。

61 栗山潛峰執編的部分為保元至建久年間的列傳及他最尊敬的北畠親房傳。栗山潛峰當時熟讀《神皇正統記》抄本,將與「國體」相關的內容點入朱批,現存「手澤本」藏於東京大學圖書館。另請參閱名越時正:〈北畠親房と水戸学の道統〉,收入平泉澄(監修):《北畠親房公の研究》(東京:日本学研究所,1954年),頁417-448。

日本史》仍然依照《資治通鑑》進行修史，其憑據是藤田幽谷的《修史始末》卷之下引用的安積澹泊所述「日本史是參用實錄及《資治通鑑》的體裁」。⁶²因為安積澹泊是前期水戶學編纂《大日本史》的核心人物。但問題在於《大日本史》是採用「南朝政統論」，波田永實認為《大日本史》承認南朝為正統，此與《通鑑》將魏視為正統並無法連成一條直線。《大日本史》將被逼迫到吉野一隅，處於頹勢的後醍醐、後村上、長慶、後龜山等南朝天皇視為正統，這是採用了《綱目》的觀點。但為何正統的皇統其王權都是衰萎或滅亡？而不正的武臣擁護的皇統則可存續至今？這個問題必須論證。亦即，當時安積澹泊、三宅觀瀾、栗山潛峰等使臣之間的共識繫以《易經》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邏輯判斷其過程作為歷史的敘述。⁶³換言之，《大日本史》承認南朝天皇為正統是以儒家「積德累仁」的觀點作為判準的基礎。

四、《大日本史》為何以漢文撰寫？

德川光圀為何不使用和文撰寫《大日本史》？眾所周知，光圀主導編纂《大日本史》以「正閏皇統，是非人臣」為目標，其主軸思想即是尊王，因此，水戶學被認為是實現明治維新、王政復古、尊王攘夷運動的思想原動力。而後期水戶學的主要人物藤田幽谷⁶⁴（1774-1826）、東湖（1806-1855）父子和會澤正志齋（1782-1863）等人以國家論的形式呈現其政治經濟思想的特質，影響到幕末尊王攘夷運動的思想體系，一度獲得日本社會的高度評價。⁶⁵而日本在近代化的過程中，天皇制國家的意識型態，助長了

62 詳請參照栗原茂幸：〈德川光圀の政治思想〉《東京都立大學法學會雜誌》，第18卷1.2合併號（1978年），頁196-198。

63 波田永實：〈国体論形成の歴史的前提—近世儒家史論における正統論の位相・『本朝通鑑』と『大日本史』を中心に〉，《流經法學》，第17卷第2号（2018年），頁29。

64 藤田幽谷為東湖之父，水戶藩儒學者。早年隨立原翠軒學習，15歲入彰考館，18歲著《正名論》。曾主持彰考館，致力於《大日本史》的編纂。其立足於朱子學，宣導大義名分、尊王、加強海防等思想，為水戶學的創立打下基礎。著有《修史始末》、《勸農或問》。

65 詳請參照本鄉隆盛：〈藤田幽谷〈正名論〉の歴史地位—水戶學研究的現況〉，收入張寶山、徐興慶（編）：《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

「國體論」的飛揚，因此《大日本史》並非容易理解的且通俗的史書。

德川幕末，隨著文字的普及，讀書風氣日趨盛行，出版業也變得興榮，能確實使用漢字、漢文書寫的公卿、貴族甚至武士等知識分子越來越多。因此不以庶民階層與女性為對象，而是以精通漢字、漢文的貴族階級、領導階級的男性為主要讀者，具有階級性與偏袒性。在德川漢學盛行的時空背景下，《大日本史》除了給日本高層的知識份子閱讀之外，還扮演了對外宣傳史觀的角色。

五、《大日本史》的編纂與朱舜水有關嗎？

寬文五年（1665）三月二十八日朱舜水抵達江戶的水戶藩邸之後，光圀與鷺峰再次面談詢問了《本朝通鑑》的編寫進程，鷺峰還記下光圀的感嘆：「本朝聖堂以本朝儒者為配位而可也。然本朝無真儒，唯藤原惺窩、林羅山而已。以二人神主為配位」⁶⁶同年七月朱舜水到水戶之後，光圀對於學問的發展以及編史的方向有了新的想法。朱舜水門生安積覺提及：「文恭（朱舜水）好看《陸宣公奏議》、《資治通鑑》。及來武江，方購得京師所鈔《通鑑綱目》。至作文字，出入經、史，上下古今，娓娓數千言，皆其腹中所蓄也。⁶⁷

寬文七年（1667）七月十四日晚，鷺峰應光圀之請，赴水戶邸。「君問國史編輯幾代，幾年成。余詳陳其趣。〔……〕」爾後，光圀向林鷺峰展示了由光圀授意，小宅生順執筆的《常陸國風土記》。⁶⁸此書經朱舜水批註而成，體裁也模仿《大明一統志》。朱舜水還對此書的綱目及體裁提出修改意見，目的是為了讓日後水戶藩編纂史官採擇。⁶⁹

頁 203-242。

66 林鷺峰：〈寬文五年（1665）三月二十八日條〉，《國史館日錄》卷 2，抄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請求記號 862-127，コマ 61-63。

67 安積澹泊：〈朱文恭遺事〉，收入朱謙之編《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 625-626。

68 林鷺峰：〈寬文七年（1667）七月十四日條〉，《國史館日錄》卷 8，抄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請求記號 862-127，コマ 14-15。

69 朱舜水：〈批常陸國誌〉，收入朱謙之編：《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水戶義公年譜》，延寶元年（1673）（光圀四十六歲）有如下的一段記載：

公（光圀）將造大成殿於府下，假設殿堂於江戶駒籠別莊。使臣僚就舜水習釋奠，啓聖公祭及祠堂墓祭儀節。又使梓人受舜水說、摸倣闕里之制。自殿堂廊廡，至門牆器物，約而刻之。藏諸府庫，使有志於制作者取法焉。《行實》。公曰：邦設學校，三代之遺法，而王道之本也。講書弘道，訓蒙化俗，莫善於斯。今諸侯府城下，營建聖廟，設庠序，招儒士，下令勸督，有二業成行立者一，褒論進其品秩。⁷⁰

朱舜水曾經大嘆當時的日本社會並未行孔子聖學之道，因此對水戶藩的漢學教育及孔子學說，舉凡釋奠、禮儀，聖廟之營建，尤其是「設庠序，招儒士」幾乎是全面性的推動，光圀表露出對舜水學風的看法，明顯是受到它的影響。特別是朱舜水曾經帶領水戶藩的儒臣武士，行先秦禮制學習釋奠，以正禮樂之秩序，⁷¹但並不贊揚春秋之後的一些聖主明君。⁷²而安積覺以先秦儒家的是非觀編寫《論贊》，讚揚或批判歷代天皇的行為也是受到朱舜水教化的影響。「尊王敬幕」及「大義名分」是光圀史觀的核心思想，在水戶藩的漢學教育普及的淺移默化過程中受到了深遠的影響。有關朱舜水、光圀的水戶史觀以及水戶學編史方針的確立，拙書、⁷³錢明⁷⁴及呂玉新⁷⁵皆有詳細的論述，本文不再贅述。

年），頁 554。

70 小宮山昌秀：《水戶義公年譜》，收入常磐神社、水戶史學會（編）：《水戶義公傳記逸話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年），頁 296、304。

71 朱舜水：〈答加藤明友書二首〉，收入朱謙之（編）：《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 74。

72 徐興慶：《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78（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8年），頁 105-116。

73 詳見徐興慶：《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頁 105-116。

74 詳請參照錢明：《勝國賓師：朱舜水傳》（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 205-212。

75 詳請參照呂玉新：《政體、文明、族群之辯：德川日本思想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 80-100、頁 152-167。

伍、結論

南北朝正閏的爭論，日本的學術界自一九一〇年以降，即浮出檯面。林羅山、林鷺峰父子兩代所孕育而成的德川儒學教育系統，無疑是長期受到幕府的保護。德川時代的日本社會，在朝在野都講究儒學理論，是做學問或發展文化事業不可或缺的氛围，而《本朝通鑑》的編纂必須順應德川幕府老中、執事們的要求進行。論述至此，可以窺知林家父子能自我論述史觀的空間是有限的。羅山、鷺峰父子在意識形態上為何無法徹底承認南朝為正統？原因在於北朝為當時皇室的祖先，持明院統是皇統的嫡流，兩統更迭之後，大覺寺統的後醍醐天皇拒絕讓位給持明院統的量仁（光明），而接受皇位的後村上天皇理應為正統的天皇，但南朝卻偏安吉野，有如南宋的亡命舟中政權，此為羅山對此問題的看法。羅山認為南朝正統來自朱子學的正統論，也同情南朝，但對《綱目》史觀下的正統政權無法給予正面的評價，為了解決此一自我矛盾的問題，接受《通鑑》的史觀成為羅山決定的要素。⁷⁶卻也留給之後鷺峰在編史史觀上難以抉擇的課題。

對光圀而言，羅山為其師，鷺峰是其前輩，是年齡相近的親友。但二人的關係，在寬文三年（1663）「武家諸法度」改正後，《本朝通鑑》編輯作業進行的過程中，二人屢屢會談，涉及對「儒者」理念的認知、史觀或對學問的根本態度都難以妥協，致二人對編史的理念大相逕庭。南朝正統論，源自南北朝時期的北畠親皇《神皇正統記》及德川光圀的《大日本史》史觀。作為尊皇斥霸，強調儒教的正統思想的南朝正統論是明治維新的主軸思想之一，其否定北朝正統的邏輯有二。（1）後醍醐天皇並未讓位給足利尊氏支持的光明天皇。（2）近代水戶學派所指足利尊氏是極端惡霸、無道，是為叛臣，此大義名分的忠臣、服從等思想充斥著後世的日本社會，關鍵還是在面對教育如何解讀的問題上。

《本朝通鑑》與《大日本史》最大的不同在於，林鷺峰編史不加入自己的意見，不批判歷史。此在《本朝通鑑》首卷「續本朝通鑑序」述及：

76 波田永實：〈国体論形成の歴史的前提—近世儒家史論における正統論の位相。『本朝通鑑』と『大日本史』を中心に〉，頁8。

若夫一字褒貶、勸善懲惡，則非所企望。然據事直書，其義自見，則豈其不為後代之鑑戒哉。由是觀之，則治世之盛事，洪業之餘烈，不在茲哉。⁷⁷

即可得到印證。

《本朝通鑑》被視為是德川幕府的正史，為的是提高將軍聲譽、肯定幕府合法性，以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盛讚將軍，將諸侯的領頭人將軍視為最高權威，成為《本朝通鑑》的主旨，它反應出十七世紀日本武家社會演進的歷史描述是不爭的事實。換言之，《本朝通鑑》仿效《資治通鑑》，所強調的核心思想是歷史事實的優先主義，它並非以道德的價值判斷或客觀的事實來編纂史書，而是透過幕府的協助與主觀的要求編纂而成，主要的閱讀對象是將軍，其目的在輔佐幕府的政治運作與宣傳，進而為其歷史定位背書，展現出武家權力所在的一種史書。

反觀水戶藩編纂《大日本史》的目的主要以「藩」政的立場為考量，與水戶學的發展息息相關，強調的是以大義名分為依歸的核心思想與尊皇論的主軸思想，有別於以展現幕府政治目的為前提之《本朝通鑑》。劉曉峰、龔卉指出：「水戶修史前期，主要出身於日本朱子學的史臣仍以中國傳統為圭臬去構建日本的國史，因此在搜集整理各地史料的基礎上強調日本也有中國式的正史傳承」。⁷⁸換言之《大日本史》的內涵可以隱約窺知是沿用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及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兩種史觀的思維模式。其編史的態度是採取記其治亂，陳其善惡，備勸善懲惡之典，以春秋之筆法，遵道義為上。善即善，惡即惡，以為後世之明鏡，強調的是水戶藩獨特的學風。光圀給綱條的詩文中提及：「治國必依仁，禍始自閨門，慎勿亂五倫。朋友盡禮儀，旦暮慮忠臣。古謂君雖以不君，臣不可不臣」。⁷⁹主張廢除儒者，明定主從關係，否定主從是一體的，而是落實仁、義等五

77 林羅山、林鷲峰：〈續本朝通鑑序〉，收入《本朝通鑑》，首卷，（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1920年），頁5。

78 劉曉峰、龔卉：〈江戶時期日本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吸收與改造—以《大日本史》編纂為例〉，《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2期），頁63-70。

79 安積澹泊：《桃源遺事》卷之二，收入常磐神社、水戶史學會（編）：《水戶義公傳記逸話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年），頁112。

倫思想的教育，進而召告後世天下治史必須以倫理為依歸。

呂玉新指出，《大日本史》以孔子的《春秋》作為編史的理論指導，而孔子著《春秋》則是藉此書闡明他提倡克己復禮，實際是為了鞏固「尊虛王」封建制的政治主張。⁸⁰此外，《大日本史》後期的編纂也受到古文辭學派荻生徂徠（1666-1728）思想的影響，對於林家強調的「儒者」，徂徠在給朱舜水門生安積澹泊的回信中指出：

西山先侯（按：光圀）、首革儒者陋習、且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寡人亦儒者也。是自非常之君所見，迥踰流俗萬萬、因又憾時相及而遇不及，恍如異代，徒為之悵望已。不佞經術，亦由聖人之道，即人君之道起見，是其根本也。雖宋儒豈不然哉！⁸¹

徂徠的思想脈絡，雖曾師從林鷺峰及其兒子林鳳岡（1645-1732），但最終卻打破了當時程朱理學在日本的統治地位。他指出德川幕府的封建制度並非神授，而是由人創立的，「理」並非神創，而是由聖人建立的。他所指的聖人之道，必須想到人民，想到社稷，並以蒼生為念，此與光圀改革儒者陋習，以人民、倫理為依歸的理念前後輝映。

德川光圀去世後，《大日本史》對後期水戶學仍影響深遠。而「南朝正統論」在水戶學的前期與後期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諸多變化，曾任彰考館總裁的藤田幽谷亦深入研究德川光圀的學問與制度，對林家所謂「儒者」的說詞與行徑不以為意，他曾於「封事」中言及：「儒者之談道，迂闊腐爛」，批判當世日本的儒者曰：

「以為讀書學古，無補當世之物修身慎獨，不能格君心之非，小廉曲謹，沽名釣譽，使人謂儒者獨善其身，而無益國家，是可羞

80 呂玉新：《政體、文明、族群之辯：德川日本思想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95。

81 荻生徂徠著，平石直昭（編）：《徂徠集•徂徠集拾遺》（東京：ぺりかん社，1985年），頁304。

也」。⁸²

藤田幽谷認為，沽名釣譽，獨善其身非「儒者」之道，強調的是光圀堅持為學須有益於國家社會的核心思想。

藤田幽谷曾經開設私塾「青藍舍」，他的門生會澤正志齋（1782-1863）提及幽谷：「十八歲著《正名論》言君臣大義，其教子弟以忠孝者本於此也」。又說：「先生恒言，學者學為君子，非學為儒者，故《論語》以君子二字始終之，又言道者成人之道，非儒者之私業」⁸³、「後學者當以成人自期，不必要為儒者，學而為君子，是則孔門之學也」。⁸⁴會澤也提及：義公（光圀）諭士臣曰：士不可以不學道，知人倫之義，匹夫之勇非所貴學道知義，雖寡人亦儒也。此以儒自處，似不與先生之意同」。⁸⁵主要闡明幽谷「非學為儒者、非儒者之私業」之教育理念，也述及光圀勸士大夫做學問主要在明人倫之道，其精神有別於以私業為主的儒者行為。⁸⁶這裡也可以明顯看出藤田幽谷的教育理念是延續德川光圀明人倫之道的核心精神。

水戶藩第九代藩主德川齊昭（1800-1860）在成立藩校「弘道館」時，曾經在「弘道館記」中揭示如下的教育理念：

嗚呼我國中士民，夙夜匪解，出入斯館，奉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教，忠孝無二，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不殊其効，敬神崇儒、無有偏黨、急衆思宣群力，以報國家無窮之恩。⁸⁷

「神儒一致、忠孝無二、文武不岐、學問與事業一致」，為「弘道館」的

82 藤田幽谷：〈丁巳封事〉，收入今井宇三郎、瀨谷義彥、尾藤正英校（注）：《水戶學》，《日本思想大系》，第53卷（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頁375。

83 會澤正志齋：《及門遺範》，收入雄山閣（編）：《日本學叢書》，第八卷（東京：雄山閣，1938年），頁37-90。

84 會澤正志齋：《及門遺範》，頁37-90。

85 會澤正志齋：《及門遺範》，頁37-90。

86 有關會澤正志齋的「道」論，請參閱藍弘岳：〈會澤正志齋的歷史敘述及其思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第1分（2018年），頁165-200。

87 水戶市史編さん委員会（編）：《水戶市史 中卷（三）》（茨城：水戶市役所，1976年），頁940-942。

校訓，而今天「弘道館」的遺跡內，仍留有鹿島神社，保存了日本建國神話的傳統，同時也可以看到孔子廟及相關的祭祀禮儀，持續傳播自古以來的聖人之道，水戶藩「敬神崇儒、無有偏黨」，繼承光圀「神儒兩道」並存的國民教育有其脈絡可循。

此外，德川光圀與林家史學所不同的是堅持前述的「三大特筆」的史觀，加上集崎門學派的人力與背景，特別在本紀部分的開篇，重新詮釋了一條垂直的天神傳承序列，醞釀成萬世一系的國體以及尊皇的思想體系，做為國家歷史發展的根基。《大日本史》受中國傳統史學影響，也以神道的思維建構「皇國」史觀，不但影響了德川幕末的日本思想界，也喚醒了明治維新的動力，至今依然影響著歷代天皇對日本歷史書的改編。波田永實質疑，至一九四〇年代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為止，牽制日本國民的「國體論」「皇國史觀」雖已被否定，但此意識形態為何仍然維持到現在？日本的學校教育，在學習上，南朝的天皇為後醍醐、後村上、長慶、後龜山等歷代天皇（大覺寺統朝廷 1336-1392，五十六年）。⁸⁸南北朝何者為正統？從教育的角度而言，為何不能明白告訴學生，「南朝就是正統」？長期以來日本小學的國定教科書、教師用教科書的記述，均採「兩朝並立論」的說法。⁸⁹換言之，日本的南北朝對立，至一三九二年，持明院統（北朝，明德三年）、大覺院統（南朝，元中九年）才回歸統一。南北朝分裂期間，何者為正統是各說各話，懸而未決。此一正統的認定問題一直延至現代，才由擔任日本歷史教科書編纂的負責人喜田貞吉，從歷史學的公正判斷，以「兩朝並立」表述公諸於世。但這種說法卻遭到日本中學教師及在野黨的反對，認為「兩朝並立」的表述是「偏向教育」，日本政府終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正式公布南朝為正統，使爭議多年的南北朝史觀演化之認定落幕。⁹⁰

88 波田永實：〈国體論の形成I—南北朝正閏論争からみた南朝正統觀の歴史認識〉，《流經法學》，第16卷第2号（2017年），頁16。

89 波田永實：〈国體論の形成I—南北朝正閏論争からみた南朝正統觀の歴史認識〉，頁16。

90 小島毅：《天皇と儒教思想 伝統はいかに創られたのか？》（東京：光文社，2018年），頁195。

引用書目

古代文獻

〔日〕小宮山昌秀

1978 《水戶義公年譜》，收入常磐神社、水戶史學會（編）：《水戶義公傳記逸話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年）。

〔日〕山鹿素行

1941 《中朝事實》，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第13卷〈附錄·或疑〉，（東京：岩波書店，1941年）。

〔日〕北畠親房（著），佐藤仁之助（校訂）

1927 《新註神皇正統記》（東京：青山堂書房，1927年）。

〔日〕安積澹泊

1974a 〈後深草天皇紀の贊〉，《大日本史贊藪》，收入松本三之介、小倉芳彦（校注）：《近世史論集》，《日本思想大系》，第48卷（東京：岩波書店，1974年）。

1974b 〈龜山天皇紀贊〉，《大日本史贊藪》，收入松本三之介、小倉芳彦（校注）：《近世史論集》，《日本思想大系》，第48卷（東京：岩波書店，1974年）。

1978 《桃源遺事》卷之二，收入常磐神社、水戶史學會（編）：《水戶義公傳記逸話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年）。

1981 〈朱文恭遺事〉，收入朱謙之編《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日〕朱舜水

1981a 〈答加藤明友書二首〉，收入朱謙之（編）：《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981b 〈批常陸國誌〉，收入朱謙之編：《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日〕林鷺峰

1920a 《本朝通鑑》，首卷，（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1920年）。

1920b 《本朝通鑑》，3卷，（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1920年）。

1662 〈寬文二年（1662）十月三日條〉，《國史館日錄》卷1，抄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

1664a 〈寬文四年（1664）十月十九日條〉，《國史館日錄》卷1，

- 抄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
- 1664b 〈寬文四年（1664）十一月二十八日條〉，《國史館日錄》卷 1，抄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
- 1664c 〈寬文四年（1664）十一月二十八日項下〉，《國史館日錄》卷 1，抄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
- 1665 〈寬文五年（1665）三月二十八日條〉，《國史館日錄》卷 2，抄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
- 1667 〈寬文七年（1667）七月十四日條〉，《國史館日錄》卷 8，抄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
- 〔日〕林鷺峰、林羅山
- 1919 〈續本朝通鑑〉卷一百三十二，收入《本朝通鑑》，第十二，（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1919年），頁 3803。
- 1920 〈續本朝通鑑序〉，收入《本朝通鑑》，首卷，（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1920年），頁 5。
- 〔日〕林羅山
- 1979 〈太伯〉，收入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東京：ぺりかん社，1979年），卷 36，頁 408。
- 〔日〕林羅山（著）、京都史蹟會（編）
- 1979 《林羅山文集 下卷》，卷 66（1918年平安考古學會版・1930年弘文館社復刻版，東京：ぺりかん社，1979年），第 804 頁下。
- 〔日〕花園天皇
- 1317 《花園天皇宸記》正和六年（1317）三月三十日條目。
- 〔日〕荻生徂徠著，平石直昭（編）
- 1985 《徂徠集・徂徠集拾遺》（東京：ぺりかん社，1985年）。
- 〔日〕會澤正志齋
- 1938 《及門遺範》，收入雄山閣（編）：《日本學叢書》，第八卷（東京：雄山閣，1938年）。
- 〔日〕藤田東湖
- 1941 《弘道館記述義》，收入菊池謙二郎（編）：《東湖全集》，（東京：博文館，1941年）。
- 〔日〕藤田幽谷
- 1973 〈丁巳封事〉，收入今井宇三郎、瀨谷義彥、尾藤正英校（注）：《水戶學》，《日本思想大系》，第 53 卷（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
- 〔日〕藤原惺窩（著）、林道春（編）

1654 《惺窩文集》，卷4（京都：田原仁左衛門尉出版，1654年）。

近人文獻

久保田収 KUBOTA, Osamu

1956 〈高野山における歴史研究〉，《密教文化》1956年，36-37號，頁22-42。

“History Studies in Koyasan,” *Journal of esoteric buddhism*, No.36-37,(1956),pp. 22-42.

小島毅 KOJIMA, Tsuyoshi

2018 《天皇と儒教思想 伝統はいかに創られたのか?》（東京：光文社，2018年），頁195。

Emperors and Confucian Thought: How Traditions Were Created, (Tokyo: Kobunsha, 2018), pp. 195.

内田周平 UCHIDA, Syuhei

1932 〈崎門学者と南朝正統論〉，收入平泉澄（編）：《闇齋先生と日本精神》（東京：至文堂，1932年），頁97-178。

“Kimon scholars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Southern Court,” in Hiraizumi, Kiyoshi (ed.), *Ansai Sensei to Nihon seishin* (Tokyo: Shibundo, 1932), pp. 97-179.

水戸市史編さん委員会（編） Mito-shi, shi hensan iinkai (ed.)

1976 《水戸市史 中巻（三）》（茨城：水戸市役所，1976年），頁940-942。

Mito-shi shi (chūkan 3), (Ibaraki: Mito shiyakusho, 1976), pp. 940-942.

本郷隆盛 HONGO, Takamori

2004 〈藤田幽谷〈正名論〉の歴史地位—水戸學研究的現況〉，收入張寶山、徐興慶（編）：《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頁203-242。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Fujita Yukoku 's Seimeiron,” in Chang Pao-San, Shyu Shing-Ching (ed.), *Analects of Confucianism in Tokugawa Japa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03-242.

玉懸博之 TAMAKAKE, Hiroyuki

1998 《日本中世思想史研究》（東京：ぺりかん社，1998年）。

Study on the thought of the medieval ages in Japan, (Tokyo: PERIKANSHA Publishing, 1998).

吉田俊純 YOSHIDA, Toshizumi

1998 〈徳川光圀の『大日本史』編纂の学問的目的—北朝正統論を

めぐって〉，《東京家政学院筑波女子大紀要》第2集，1998年，頁1-28。

“What did Tokugawa Mitsukuni Solve in “*Dainihonshi*”(The History of Great Japan)?,” *Bulletin of Tokyo Kasei Gakuin Tsukuba Women's University*, Vol.2, (1998), pp. 1-28.

名越時正 NAGOYA, Tokimasa

1954 〈北畠親房と水戸学の道統〉，收入平泉澄（監修）：《北畠親房公の研究》（東京：日本学研究所，1954年），頁417-448。
“Kitabatake Chikafusa to Mitogaku no dōtō,” in Hiraizumi, Kiyoshi (ed.), *Kitabatake Chikafusa kō no kenkyū* (Tokyo: Nihongaku Kenkyūjo, 1954), pp. 417-448.

1985 〈水戸藩における崎門学者の功績〉，《水戸光圀とその餘光》（東京：錦正社，1985年），頁163。
“Achievements of Kimon scholars in the Mito Domain,” *Mito Mitsukuni to sono yokō* (Tokyo: Kinseisha, 1985), pp. 163.

安川實 YASUKAWA, Minoru

1980 《本朝通鑑の研究—林家史学の展開とその影響》（東京：言叢社，1980年），頁195。
Honchō tsugan no kenkyū: Haysshi-ke shihgaku no tenkai to sono eikyō, (Tokyo: Gensōsha, 1980), pp. 195.

吳偉明 NG, Wai-ming

2014 〈日本德川前期吳太伯論的思想史意義〉，《新史學》二十五卷三期，2014年9月，頁143-170。
“Wu Taibo in Early Tokugawa Thought,” *New History Journal*, Vol.25, No.3, (Sep, 2014), pp. 22-42.

呂玉新 LU, Yu-xin

2017 《政體、文明、族群之辯：德川日本思想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
Polity, Civi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 Political Thoughts in Tokugawa Japa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7).

坂本太郎 SAKAMOTO, Tarō

1966 《日本の修史と史学（日本歴史新書）》（東京：至文堂，1966年），頁158。
Nihon no shūshi to shihaku, (Tokyo: Shibundō, 1966), pp. 158.

村上元三 MURAKAMI, Genzō

2000 《水戸光圀》（中卷），（東京：學陽書房，2000年），頁215-216。
Mito Mitsukuni Chu, (Tokyo: Gakuyo Syobo, 2000), pp.215-216.

- 武田祐樹 TAKEGA, Yuki
 2014 〈林家の學術と歴史書の編纂〉，《國際日本文學研究集會會議錄》（東京：国文学研究資料館，2014年），頁7、13。
 “Rinke's Scholarship and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Book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Japanese Literature in Japan*, Tokyo; National Institute of Japanese Literature, 2014, pp. 7, 13.
- 波田永實 HATA, Nagami
 2017 〈国体論の形成 I —南北朝正閏論争からみた南朝正統観の歴史認識〉，《流經法學》，第16卷第2号（2017年），頁16。
 “A Study on Formation of National Polity Theory “Kokutairon” I,”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Law*, Vol.16, No.2, (2017), pp. 16.
 2018 〈国体論形成の歴史的前提—近世儒家史論における正統論の位相・『本朝通鑑』と『大日本史』を中心に〉，《流經法學》，第17卷第2号（2018年），頁8、頁29。
 “The Historical Premise on Formation of National Polity Theory “Kokutairon”,”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Law*, Vol.17, No.2, (2018), pp. 8, 29.
- 徐興慶 SHYU, Shing-Ching
 2008 《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78（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8年）。
Chu Shun-shui and East Asian Cultural Diffusion, Research in East Asian Civilizations—Studies in East Asian Civilizations Series 78,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栗原茂幸 KURIHARA, Shigeyuki
 1978 〈徳川光圀の政治思想〉《東京都立大學法學會雜誌》，第18卷1.2合併號（1978年），頁196-198。
 “Tokugawa Mitsukuni no seiji shisō,” *Toritsu Daigaku hōgakkai zasshi*, Vol.18, nos 1-2 (1978), pp. 196-198.
- 高橋章則 TAKAHASHI, Akinori
 1991 〈弘文院学士の成立と林鷺峰〉，《東北大學日本語學科論集》第1卷（1991年），147-159頁。
 “Hayashi Gaho's Acquirement of the title “Kobunin Gakushi”,”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Tohoku University*, Vol.1, (1991), pp. 147-159.
- 張崑將 CHANG, Kun-chiang
 2003 〈日本徳川時代神儒兼攝學者對「神道」「儒道」的解釋特色〉，《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8期（2003年），頁15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 Shintōist Thinkers’ Interpretation

- of Confucianism and Shintōism in Tokugawa Japan,” *NTU Humanitas Taiwanica*, Vol.58, (2003), pp. 153.
- 鳥巢通明 TORISU, Michiaki
1957 〈大日本史と崎門史学の關係〉，日本學協會編《大日本史の研究》（東京：立花書房，1957年），頁235-280。
““Dainihonshi” to Kimon shigaku no kankei,” in Nihongakukyokai (ed.), *Dainihonshi no Kenkyu* (Tokyo: Tachibana shobo, 1957), pp. 235-280.
- 揖斐高 IBI, Takashi
2015 〈林家の危機—林鷺峰と息子梅洞〉，《成蹊國文》第48號（2015年），頁5。
“Hayashike no kiki : Hayashi Gahō to musuko Baido,” *seikei kokubun*, No.48, (2015), pp. 5.
- 劉曉峰、龔卉 LIU, Xiao-feng, GONG, Hui
2019 〈江戸時期日本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吸收與改造—以《大日本史》編纂為例〉，《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2期），頁63-70。
“The Accept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Edo Period of Japan,” *Nankai Journal(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268, (2019), pp.63-70.
- 錢明 QIAN, Ming
2008 《勝國賓師：朱舜水傳》（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Sheng guo bin shi: Zhu Shunshui zhuan, (Zhejiang: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藍弘岳 LAN, Hung-yueh
2018 〈會澤正志齋的歷史敘述及其思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第1分（2018年），頁165-200。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the Thought of Aizawa Seishisai (1782~1863),”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89, Part1, (2018), pp. 165-200.
- 藤實久美子 FUJIZANE, Kumiko
1999 〈『本朝通鑑』編修と史料収集：対朝廷・武家の場合〉，《史料館研究紀要》第30號（1999年），頁116。
“The collection and Editing of “Honcho-Tsugan” : A Comparison of the Cases of the Court and Military Houses,” *The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No.30, (1999), pp. 116.

